Globethics Reposi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羅馬教廷與意德法西斯政權的關係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u, Wei Ming;Zheng, Yin Da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16 07:00:2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61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羅馬教廷與意德法西斯政權的關係

顧衛民(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鄭寅達(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羅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會的中樞，在一九二九年《拉特蘭條約》簽訂之前，它稱為教皇國；在這以後則稱為「梵蒂崗城國」(The 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意大利領土的一部分曾為教皇國領地，且居民的絕大多數均為天主教教民。至於德國，它雖然是近代宗教改革的發源地，但天主教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尤其在南部巴伐利亞洲等地。

羅馬教廷自稱為國際法人團體，且自中世紀以來即向各國派使和接使，具有超越國家的權威。儘管近代以來此種權威一再受到挑戰並遭削弱，但並未消彌。自一九一〇年代末開始，法西斯運動先後在意大利和德國生成，並相繼在兩國攫取了政權。無論是墨索里尼標榜的「國家至上」學說或是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都在強調「國家」或「民族」利益的過程中，將意德兩國引向獨裁與極權之路，這一過程必然地涉及對國家內部結構的大規模改造，由此而觸及天主教會的組織系統，從而引發與羅馬教廷的關係。本文擬就此一史學界關注殊少的問題，作一初步的探討。

自中世紀以來，教皇國一直在意大利擁有不少領土，

但近代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以後，國勢衰微，領地銳減。一八一五年，在拿破侖帝國覆滅以後，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上恢復了一度受到法國大革命猛烈衝擊的教皇國，並委托奧地利與法國保護。當時教皇國與撒丁王國(Sardinia)、莫德納(Modena)、那不勒斯(Naples)等並列為意大利九個邦。[1]

一八四〇年代以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方興未艾。撒丁王國成為統一運動的中心，其首相加富爾(Count C.B. Carvour)漸次將巴馬、托斯卡里等邦併入撒丁王國之中。一八六〇年，另一位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的志士加里波的(Caribaldi)率紅衫軍在西西里起事，渡海攻佔那不勒斯。加富爾乘機向教皇國的軍隊發動進攻，與加里波的軍隊會師。次年，意大利王國宣告成立，伊曼紐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為國王。[2]當時教皇國三分之二領土及四分之三臣民併入了意大利王國，僅餘羅馬一城，只是依靠法國軍隊的保護才得以維持不墮。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法軍在色當全線潰敗，駐羅馬的法軍被迫撤回國內。加里波的率意軍於九月二十日從羅馬庇阿門(Porta pia)入城，十月二日，經人民投票決定將羅馬城併入意大利王國，並定為首都。

一九七一年五月，意大利政府宣佈《保障法》(Law of Guarantees)，表示願償付教廷三百二十二萬五千里拉，作為對奪取教皇國土地的賠償。當時的教皇庇護九世(Pius IX，1846-1878年在位)視其為單方面的片面條約，拒絕接受，並否認一切既成事實。為此，教皇自動幽居梵蒂崗，以後

1. *The Vatican and Christian Rome*《梵蒂岡與基督教羅馬》，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1974，頁104。
2. 同上。

繼任的教皇均發誓不出梵蒂崗一步，自稱「梵蒂崗之囚」(Prisoner of the Vatican)，表示自己為受迫害者。為抵制意大利王國，教廷規定：意大利王室成員一概不許領受教會聖事；外國元首到羅馬訪問者，凡謁見意大利君主，教皇即拒絕接待；教會禁止意大利的教友參加政府工作。這就是歐洲政治史和外交史上有名的「羅馬問題」(Rome Question)。[3]

意大利王國雖然佔領了教皇國的土地，但在宗教事務上奉行當時為歐洲各國普遍採用的政教分離原則。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意大利處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 1842-1928)當政時期。焦利蒂早年出身官僚家庭，接受法律教育並當過律師。一八八二年出任樞密院顧問和國會議員。他於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一九〇三－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一－一九一四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五度出任政府首相。作為溫和的自由派領導人，焦利蒂在內政方面曾作了一些自由主義改革；如向工人提供國家保險，承認工人組織的合法化和罷工的權利，並擴大選舉權等等。同時他亦維護金融資本家和地主的權益，保護關稅並增加軍費開支。這一時期，意大利發動了對土耳其的戰爭(1911-1912)，侵佔了的黎波里、昔蘭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島，國力和國勢均有顯著提高。[4]在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上，焦利蒂堅定地推行卡富爾倡導的「自由的國家，自由的教會」政教分離原則。「在焦利蒂看來，教會與國教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價值系列，分別屬於兩

3. Albert M. Craig，*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世界文明遺產》，New York，1986，頁174；赫德等編，《意大利簡史》，商務印書館，1975，頁316-317。
4. 斯帕多利尼，《締造意大利的精英——以人物為線索的意大利近代史》，世界知識出版社，頁420-431。

個不同的世界」，「教會與國家應盡量少交叉、少碰撞，各自應在自己的領域裏活動」。[5]政府絕少干預教會事務，保證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由於政教關係的平和，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天主教教民與世俗人士並肩作戰，為國效力。同時，天主教人士的政治權利亦有提高。一九一九年，斯圖佐(Sturzo, 1871-1959)神父創立了意大利人民黨(即天民黨的前身)，開創了意大利教友參加政治活動的先河。[6]當時的教皇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位)改變了禁止教友參加政治活動的態度，予以支持。同時，教會雖然在形式上不許教民投票，但事實上許多教民參加了投票選舉，有些人還當選為國會議員。

自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意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並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九二二年十月，國家法西斯黨黨魁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率領武裝黨徒從米蘭進軍羅馬，迫使國王交出政權，任命他為首相。以後，他還逐漸取消議會制度，將意大利改造成極權主義的國家。[7]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能夠贏得政權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墨索里尼本來是社會黨黨員，最初的法西斯黨綱中也曾有明顯的反教權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如「沒收超額戰爭利潤的85%」，「沒收宗教團體的全部財產，取消一切主教的薪俸」，「對資本課以累進性重稅」等措施。[8]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墨索里尼意識到

5. 同上。
6. 巴蒂斯特，《天主教簡史》，天主教上海光啟社，1995，頁35。
7. 勒文翰，郭聖銘，孫道天主編，《世界歷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頁717。
8.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271。

欲達到權力的頂峰，必須獲得意大利社會中傳統的有勢力階層的支持，包括王室、資產階級和天主教會。為爭取這些人士的支持，墨索里尼後來又不斷發表諸如「勞資合作」、反共和「讓梵蒂崗的光輝普照大地」等另一種調門的言論。從當時國內的形勢來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有七十萬人喪生，戰費支出高達四百六十億里拉；意大利雖為戰勝國，卻勝之不武，負債達八十萬億里拉，經濟蕭條，民生凋蔽。在蘇俄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意大利工人階級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僅一九一九年的工潮達一千八百七十一次，參加者達一百五十五萬人次。這種工潮迭起的狀況使擔心「赤化」的王室、資產階級和天主教會甚為憂慮。[9]而墨索里尼所宣稱的「只要共產主義者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和他們之間只能有戰鬥」話語，深為上層社會所認同。雖然國王、資產階級和教會曾擔心法西斯黨人的集權慾，但因視其為反共的有生力量而加以支持。

墨索里尼在上台以後的施政當中，將處理國家和天主教會的事務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他曾說：「能解決羅馬問題的人，定是最偉大的政治家」。當時在位的教皇庇護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年在位)[10]也一度認為「看來只有墨索里尼能夠把意大利這隻船駕駛到平靜的海洋」。[11]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墨索里尼政府和庇護十一世領導下的教

9. 劉明翰，《羅馬教皇列傳》，東方出版社，1995，頁220。
10. 庇護十一世(Pius XI)，原名拉底(Ambrogio Damiano Achille Ratti, 1857-1937)，生於米蘭附近的德里奧，一八七九年升神父，一八八二年在米蘭大修院任神學教授。一八八八至一九一一年在米蘭安布羅斯圖書館工作。一九〇七年升院長。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八年在梵蒂崗圖書館工作。一九一八年四月被當時的教皇本篤十五世派往米蘭，任教廷駐華沙的宗座使節；次年任教廷駐波蘭公使，領總主教銜。一九二一年六月調任米蘭總主教並冊封樞機。本篤十五世去世以後，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就任新教皇。*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天主教新百科全書》，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Vol. 11，1967，頁411-412。
11. 劉明翰，《羅馬教皇列傳》，同前，頁220。

廷舉行為時三年的秘密談判，最終達成了協議。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廷國務卿嘉斯巴里樞機(Card. Gasparri)與意大利政府首相墨索里尼，分別代表教皇庇護十一世和意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正式簽訂了《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ies)，因訂約地點在拉特蘭宮，故名。其主要內容為：(一)意大利承認教皇對梵蒂崗擁有完全的行政權、司法權和領土權，包括聖彼得大教堂、教皇宮殿、博物館、圖書館和毗連的花園，另外，羅馬城中的各大教堂、宗座大學、教廷機構亦享有治外法權。教皇則放棄意大利境內原屬教皇國的土地。由此宣告「梵蒂崗城國」的成立。(二)意大利承認天主教具有國教的崇高地位；天主教會具有法人資格，對教會財產有權自由處理；天主教婚姻與民法婚姻同樣有效；天主教教育是公共教育的基礎，宗教課程在意大利中小學列為必修，而且應用於大學教育；意大利政府承認國內的「公教進行會」為合法組織。(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及各級教士，但意大利政府有從政治上對候選人提出異議的權利，主教要向國家元首宣誓效忠；意大利政府可以認為某些教士不適合擔任神職提出異議，地方教會當局則應在三個月內對政府的指控作出答覆，任何教士都不得參加政治活動。(四)意大利政府賠償教廷七億五千萬里拉的現金和價值十億里拉的證券，其利率為5%，作為教皇國土地損失的補償。[12]

《拉特蘭條約》是羅馬教廷與法西斯政權雙方妥協的產物。當時意大利國內天主教人民黨的勢力頗大，在一九二四年第二十七屆意大利議會中，共有議員五百三十五人，

12. 張訓謀，《教廷同各國簽訂的「政教協定」》(上)，載《宗教與世界》，北京，1995(5)。《天主教新百科全書》，同前，頁414；齊世榮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二分冊，頁76-81。

其中社會黨一百二十三人，天主教人民黨有一百零八人，法西斯分子僅三十八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意大利全國共設市鎮八千三百二十七個。在一九二〇年的秋季選舉中，社會黨在二千一百六十六個市鎮中取勝，人民黨在一千六百五十個市鎮中取勝。[13]一九二四年在北部布里扎昂的選舉中，人民黨竟以二萬四千票的絕對優勢戰勝了法西斯黨。[14]為此，法西斯政權曾向教廷提出詰難。庇護十一世對天主教人民黨的活動作了某種制約，一九二六年竟同意該黨解散，斯圖佐一度流亡國外。作為回應，墨索里尼亦向教廷示好，規定意大利中小學重新安上十字架，並開設宗教課程，宗教游行亦不受干擾，而民政當局在朝聖之年幫助教會運送朝聖者。

教廷方面認為，通過《拉特蘭條約》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與《保障法》相比，《拉特蘭條約》不是單方面的條件，而是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並在教皇指定的條件下由教皇接受的。梵蒂崗擁有主權國家的一切特性，如立法權、領土權、警察權、制定國旗、錢幣、郵政以及向各國派使和接使的權利。在法西斯方面，墨索里尼通過教廷任命的主教和教士須向國家宣誓效忠的條款，變相控制了意大利高級教職的人選。教士不得參加政治活動的規定也限制天主教會參政的可能性。[15]在圍繞天主教童子軍的歸屬上，教廷同意將其併入法西斯青少年組織。教廷原希望劃給一條由梵蒂崗聯結某海港的通道，但墨索里尼並不同意，代之以

13.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同前，頁290。
14. 劉明翰，《羅馬教皇列傳》，同前，頁220-223。
15. 根據《拉特蘭條約》第十九條：「教廷在提名大主教、管區主教或有合法繼任權的副主教以前，應將候選人名字通知意大利政府，以便確知意大利政府並無政治性質的反對意見。」第二十條，「主教在就任教座以前，應向意大利國家元首宣誓效忠……」

「保障教廷的通訊自由」。

然而，雙方的妥協僅僅是暫時的。

墨索里尼對於宗教並沒有十分完整而清晰的看法，他對於天主教會的態度，主要是從直接的利益着眼。但是，法西斯政權的極權特質，遲早會與天主教會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義學說〉一文曾闡述其國家觀：「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在國家之外不存在任何具有人性和精神的東西，更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是民族的法律形式，在國家之外，既沒有個人，也沒有集團(政黨、團體、工會、階級)」。[16]在這種國家理論的指導下，政府在教育方面以「教育改革」的名義將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全部教育納入法西斯軌道；並從教材編寫、課程安排、考試升學、師資培養和教育官員任命諸方面加強政府對教育的管制。[17]墨索里尼公開申明：「兒童到了入學年齡，便隸屬於國家，且是完全隸屬於國家，決不能分屬別人」。這種做法，完全有悖於天主教學校一貫的宗教教育傳統。尤其嚴重的是，法西斯政權違反《拉特蘭條約》，逐漸將矛頭指向「公教進行會」的天主教社會組織。

「公教進行會」(Catholic Action，簡稱公進會)是天主教在俗教徒的組織。一八六八年，教皇國行將解體前夕，教皇庇護九世(Pius IX，1846-1878年在位)為挽救危局號召意大利天主教徒組織起來，以「行動」保護天主教會，時稱「天主教行動」。一九〇二年，教皇良十三世(Leo XIII，1878-1907年在位)正式命名為「公教進行會」。一九二八

16.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同前，頁320-321。
17. 同上，頁333。

年，庇護十一世親自為該會制定章程，規定它為在俗教徒從事傳教的組織，將天主教的原則貫徹於家庭和社會生活中。凡天主教徒，不論年齡性別、階層職業均可參加。[18]意大利是「公進會」的策源地，其分支組織如「公教農民青年會」、「公教學生青年會」的活動尤為頻繁，並由此擴散到歐洲各地，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已分佈於全世界十九個國家。

「公教進行會」作為一個天主教社會運動，具有國際性，明顯地游離於法西斯國家體制之外，越出了以「職團體系」為架構的控制網絡，為意大利政府所不能容忍。從一九三〇年底起，法西斯黨開始在全國各地攻擊「公教進行會」、尤其是「公教學生青年會」。許多地方的公進會遭到取締，會場被搶劫一空，人員也遭到毆打凌辱。墨索里尼認為非屬國家統制的社會組織和青年組織均應解散。

於是，羅馬教廷作出了反應。事實上，早在一九二九年，教皇庇護十一世就在《神聖的導師》(*Divini illus Magistri*)通諭中指摘了政府壟斷教育的現象，也抨擊了侵犯公進會的行為，指出這等於「侵犯了教皇的眼珠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教皇在秘密狀態中撰寫的另一份通諭——《我們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在法國的一家通訊社發表。教皇直接指摘了對公進會的攻擊，並稱教育和陶冶青年是教會正當的權利：

> 我們從未否認過，政府有教育國民的義務和權利，但說國民自幼至長毫無例外地隸屬於國家，是天主教的原則不能相容的，也是違反家庭天賦的權利。

18.《簡明基督教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1988，頁124。

教皇指出，對國家權威的過分崇拜，等於是「對國家的異教偶像崇拜」，它會導致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因為社會是為人而設的，而不是人為社會而生存：

> 倘一個城市和國家只認其自身是它存在的目的，一個國民只以國家為他的目的，一個城市只認為該向它貢獻一切，它該吸收一切，那都不是天主教的。[19]

由於法西斯秘密警察的封鎖，教皇這份通諭交給一名幹練的美國教士史貝爾曼(Spellman)帶往法國巴黎的一家通訊社發表，引起一時的轟動。[20]

梵蒂崗的指摘並沒有改變法西斯政權的意志，但是墨索里尼亦深知天主教會在意大利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據一九二一年統計，意大利人95%以上是天主教徒、有神父十一萬人。[21]全體教民都極度崇敬教皇。不顧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一意排斥教會不僅會遭致世界輿論的批評，而且對鞏固法西斯政權也有害無益。因此，墨索里尼一方面表白無意反對教會，另一方面在學校教育中刻意保留了宗教教育以示妥協，他深知反宗教所能達到的限度。

同意大利法西斯黨相比，德國納粹政權與教會的衝突更為深刻和持久。希特勒(Adolf Hitler)雖然名義上是天主

---

19. 穆啟蒙，《天主教史》，卷四，台灣：光啟出版社，1990。
20. 鍾國屏，〈介紹史貝爾曼樞機〉，載《益世周刊》，卷十三，第24期。
史貝爾曼生於一八九九年五月，祖先是從愛爾蘭遷居美國的天主教移民。他早年在耶穌會的紐約福德漢大學讀書，一九一一年去羅馬，一九一六年升神父，後被派回波斯頓教區。一九二五年入教廷供職。一九三九年升主教，一九三九年升紐約總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成為同盟國軍的隨軍總主教。一九四六年封為樞機。
21. 朱庭光，《法西斯體制研究》，同前，頁486。

教徒，但實際上是一個宗教虛無主義者。當時，納粹黨內對基督教會有兩種態度，如勃蘭登堡黨區領袖庫貝和政府宗教部部長克爾認為基督教與民族社會主義有調和的可能性，但從事納粹文化教育工作的羅森貝格則堅決認為民族社會主義的使命之一是摧毀基督教。希特勒對這兩種態度都不表示完全的贊同。他基本上將納粹政權與教會的關係視為一個根據實際情況來處理的權力問題和政治問題。[22]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指摘天主教會干預政治，然而，對於天主教的不妥協精神和等級制度系統他又抱有敬意。同時，他也深信「一個政治性的黨派要進行宗教改革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教會確實是人民所需要的，它是一個強大的和穩定的因素」。因此，只要宗教「對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沒有危險，黨贊成積極的基督教信仰」。[23]實際上，在內心深處，他希望由國家、甚至是元首本人來控制教會。他曾說：

> 只要賴比(Reibi-Reich-Bishop全國主教)有能耐就好，他們到底為什麼要派這樣一個小小的隨軍牧師來呢？我是願意全力支持他的。通過我，基督教可以像在英國一樣成為國教。

他不喜歡基督教超越國家的性質和博愛的精神：

> 我們的不幸恰恰在於信錯了一門宗教，我們為什麼不信奉日本人那種把為祖國捐軀視為至上美德的宗教呢，伊斯蘭教也比基督教連同它那寬容精神更適合我們。[24]

---

22. 埃爾德曼著，《德意志史》，卷四，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482-483。
23. 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頁332。
24. 施佩爾，《第三帝國內幕》，三聯書店，1982，頁91-93。

一九三三年，納粹政權與羅馬教廷簽訂了政教協定，它是雙方根據當時的現實情況和實際需要互相妥協的產物。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為內閣總理。希特勒領導的是一個依靠國會內多數人支持的內閣。但是參加內閣的納粹黨在國會五百八十四個席位中只佔有一百九十六席，即使加上與它聯盟的民族人民黨五十二席，也不足構成半數。為了爭取多數的支持，希特勒需要天主教中央黨七十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頭幾個小時中，希特勒派戈林去同中央黨領袖談判。據戈林報告，中央黨堅持要求「一定的讓步」。希特勒請中央黨領袖卡斯主教(Monsignor Kaas)提出一份問題的清單，作為談判的基礎。卡斯主教則要求希特勒按照憲法程序來實施統治。希特勒拒絕卡斯要求的同時，向其他內閣成員偽稱中央黨提出非法要求，無達成協議的可能。最後，他要求解散國會，舉行新的選舉。新選舉於三月五日舉行，納粹黨的得票率從上次選舉的33.1%猛增到43.9%，在總數六百四十七席佔據二百八十八席。[25]

三月二十三日，在選舉中獲得成功的希特勒，考慮到基督教在民衆中的影響及國際聲譽，尤其是希望德國天主教會放棄充當政治反對派的角色，在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稱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答應尊重信仰的權利，宣稱政府的「志向是謀求教會與國家之間的融洽協調」，而且明確表示「我們希望改善與羅馬教廷的關係」。[26]這是暗示願意與教廷達成政教協定。四月，德國政府即與教廷開始舉行雙邊會談。

---

25. 參見埃爾德曼，《德意志史》，同前，附表30。
26. 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同前，頁332。

從天主教方面來說，羅馬教廷也有與納粹政權達成政教協定的願望。德國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策源地。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當政時期一度發動了對天主教的激烈的「文化鬥爭」，德國天主教曾備受壓抑。一八七〇年，普魯士邦議會和德意志帝國議會中的天主教黨團組成「中央黨」(Zentrum)，以抵抗「文化鬥爭」。「中央黨」是有力量的政黨，俾斯麥晚年終於重新恢復了與教廷中斷十年的外交關係，並逐漸取消反宗教法案。「中央黨」愈戰愈強，到十九世紀末已收回了中小學校和大學、以及教會醫院和慈善機構。[27]

二十世紀初期，「中央黨」一度成為帝國議會中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在一九一二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票27.7%，中央黨得票22.9%，只少3到5個百分點。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德國的戰敗和割地賠款，天主教會也遭受了損失。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的制憲「國民會議」選舉中，儘管中央黨還是第二大黨，但得票率僅為19.7%，比社會民主黨的37.9%少了16個百分點，比第三大黨民主黨只高1.2個百分點。《凡爾賽條約》使德國失去斯特拉斯堡和梅斯兩個主教區，以及波森和卡爾姆教區的大部分，但澤自由市也脫離了德國。一九二二年，教廷在但澤設宗座代牧區，[28]一九二五年升格為正式的主教區。

魏瑪共和國時期，政府奉行民主國家通行的政教分離原則。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生效的「魏瑪憲法」中，規定了保障宗教自由，保障教會學校權益以及宗教團體的自由度和

27. 埃爾德曼，《德意志史》，同前，頁62。
28. 張訓謀，《教廷與各國簽訂的「政教協定」》(上)，同前，頁6。

自決權。一九二〇年，德國在羅馬教廷設立大使館，取代以前的普魯士代表團。當時教廷也希望同德國訂約派使，但由於德國國內敵視教會的自由派人士以及新教團體的反對而沒有成功。教廷則利用德國中央政府與各邦政府的矛盾，先後與數個邦簽訂了條約。一九二四年首先同巴伐利亞邦訂約，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同巴登邦訂約。除了巴伐利亞以外，德國各邦主教座堂教士團選舉主教的傳統權利得到保留，但被限定在教廷提出的三名候選人之間。除科隆以外，又設帕登博恩、布雷斯勞兩教省和亞琛、柏林主教區。[29]所以，當一九三三年納粹政權上台以後表示願意與教廷改善關係之時，教廷認為與德國中央政府訂約的時機已經到來。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德國政府與教廷在羅馬正式簽訂了政教協定。九月十日，雙方正式交換文本。該協定規定：(1)新協定適用於德國各邦，但教廷原先與有些邦的協議仍然有效。(2)教會禮拜的自由權利，教會團體的自治得到國家的保護和確認。(3)教士在精神領域的功用得到特別保護。(4)公共機構中有關的教牧問題應保證妥善解決。(5)天主教的社會受到保護。(6)德國天主教主教團要與全國政府永久合作。(7)國家允許教會的宗教指導和對私立學校的指導。(8)教士不得參與政治活動。[30]

德國方面負責訂約的巴本副總理是天主教徒，原為「中央黨」黨員，後違反黨紀被開除出黨。教廷方面則是國務卿巴賽利樞機主教。[31]

---

29. 同上，頁6-7。
30. 同上。
31. 巴賽利樞機，原名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一八七六年生於羅馬，其父為教皇良十三世的法律顧問。巴賽利早年就讀格里高利大學，一八九九年升神

當時，教廷認為，德國既然宣稱保護教會的宗教和教育權利，維持以前各州的協議，便可以與之訂約。但事實上，德國政府獲得了德國主教團保誠的保證和教士不參與政治的允諾，從而取消了「中央黨」的政治影響。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即在政教協定簽訂前十數天，「中央黨」已經在德國解散非法西斯政黨的浪潮中宣佈自行解散了。[32]政教協定顯然對德國政府有利。

但即便如此，協定墨跡未乾，納粹便違反和踐踏了它。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即政教協定簽訂後第五天，德國政府便頒佈了一項淨化法令，開始有步驟地解散天主教青年聯盟。[33]不久以後，教會的學校和社團也遭到排斥，宗教課程不同程度地被勒令停止或取消，因為納粹要在學校中向學生灌輸民族社會主義理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文科部建議學校圖書館添置羅森貝格宣揚種族主義的《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教廷將此書列為禁書，禁止教徒閱讀。明斯特主教加倫(Von Galen)禁止本教區的教友參加羅森貝格組織的大會。教會方面也出版著作揭露《二十世紀的神話》的欺騙性。由此，衝突爆發了。納粹警察開始揭發天主教教士在套用外滙方面的罪行，同時也揭發了修道院裏同性戀的醜聞。有不少教士、修女和教徒被捕。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德國「公教進行會」領導人埃里希．克勞斯納在希特勒清洗政敵

父。一九〇一年入教廷國務院，協助國務卿嘉斯巴里起草法典。一九一七年授總主教銜，同被派往巴伐利亞邦首府慕黑任宗座使節。一九二〇年，他又成為教廷駐德國中央政府的使節駐節柏林。一九二九年被冊封為樞機，同時調回教廷任國務卿。由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年他一直在德國從事外交工作，對德國情況十分了解，因而主持對德國的談判。一九三九年三月，巴賽利在庇護十一世去後繼任為新教皇，法號庇護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年在位)。

32. 《天主教新百科全書》，同前，頁418。

33. 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同前，頁333。

的「長刀之夜」中遭到殺害。直到一九三六年，納粹與天主教會的關係才有所好轉，是年希特勒在西班牙的軍事干涉有利於佛朗哥和天主教會，同時，當年在柏林舉行奧運會也需要局勢的平靖以搏取國際觀瞻。[34]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德國政府完成了國家對青年的統制，它規定「德國所有青年，除家庭及學校教育以外，無論在物質、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要按照民社黨的精神，為服務民衆和公益接受『希特勒青年團的』教育」。它將德國所有的青年，從十歲至服兵役的年齡，全部掌握在國家手中。教會的學校、團體、組織毫無例外地納入這一軌道。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發表了在極度秘密的狀態下用德文撰寫的《火焚般的焦慮》通諭(*Mit Brennender Sorge*)，它是以德籍樞機福爾哈貝爾(Card. Faulhaber)根據德國主教在羅馬舉行的會議草案為基礎寫成的。這份通諭避過德國秘密警察的監視，傳播到德國境內，並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棕枝主日，[35]在德國所有天主堂中由神職人員向教民宣佈。庇護十一世宣稱，天主教會與納粹政權的衝突，責任完全在後者。因為納粹政權「規避」和「破壞」了雙方的契約，散佈「懷疑、不睦、仇恨和中傷」的情緒，「播種公開的和秘密的根本敵視基督教的莠草」。教皇指出，民族社會主義者盜用天主教的概念，造成意義上的混亂，如用「啟示」轉意「血統和種族的提示」，「信仰」則被解釋為未來的歷史性勝利等，這是一種以假亂眞的行為。教皇明確地預示，在「德國的天際」看到

34. 埃爾德曼，《德意志史》，同前，頁62。
35. 棕枝主日(Palm Sunday)紀念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節日，亦稱主進聖城節。教會規定該日為復活節前一周星期日，該日教堂多以棕枝為裝飾。

了「摧殘性宗教的烏雲……這種戰爭除了……滅絕人類以外沒有其他目的」。[36]教皇認為納粹的本質是反宗教的：

> (納粹)把種族，國家的人民及掌權者予以神化而加以崇拜，把一個人同基督並列，向宗教學校公開宣戰。這是一種新的侵略性的異教思想，被有勢力的人以種種方式推進。以隱密的或公開的強制手段，以恐嚇和利誘(許以經濟的利益或政府的地位，或以褫奪公民權相恫嚇)，企圖使德國人民叛離教會。這一切都是侵犯天賦的人權。[37]

最後，教皇以嘲諷的口氣對自詡武力的納粹黨人說：「教會不需要從任何人那裏接受英雄主義式的教訓。這種以革新者姿態出現的惹人憎恨的傲慢，以可憐的方式譏諷信徒的謙遜，認為這是自貶人格，其實他們自己才眞是自找沒趣」。[38]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正式訪問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離開了羅馬，他說這是為了「避免眼見那已經準備好了的，與基督十字架為敵的另一種十字架崇拜儀式」。[39]

根據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也就在一九三八年，教皇庇護十一世準備起草另一份全面抨擊納粹政權及其排猶主義的通諭《人類團結》，但在次年三月準備發表的前夕，教皇不期而逝，該通諭因而擱置未發。據一九九六年一月，法文*Choicir*(《選擇》)第433期披露的情節如下：[40]

---

3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同前，頁333。
37. 穆啟蒙，《天主教史》，同前，頁137-138。
38. 同上，頁138。
39. 同上。
40. *Choisir*《選擇》，4/1997(433)，上海天主教光啟社沈保義老先生提供原文。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教皇庇護十一世在羅馬近郊岡道爾夫宮召見了一位途經意大利的美國耶穌會士拉法熱(John LaFarge)，教皇請他起草一份名叫《人類團結》的通諭。拉法熱的父親是法國布列塔尼貴族，母親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家庭的後裔。他本人畢業於哈佛大學，通曉十九種語言。拉法熱早年服務於黑人教會的堂區，對種族隔離的不平等現象深有感觸，曾著《各種族間的正義》，認為種族主義是文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反映。因此，教皇認為他是起草通諭的最合適人選。

從一九三八年夏開始，拉法熱留在巴黎，在法國耶穌會神父德比夸(Gustave Desbuquois)和德國耶穌會神父貢德拉赫(Gustave Gundlach)協助之下，利用法國「耶穌會社會問題研究中心」的資料開始撰寫通諭。這份通諭的第一部分指出，當時社會發生嚴重災亂的根源，「是由於人們用『原子機制』來演繹人類社會。物質主義思想在忽視人類精神幅度的同時，把社會看成是一架機器，而人就是這架機器中的零件，個體完全被國家所犧牲」，而納粹的異教思想「無法把人類團結建立在一個造物主的思想基礎上，只能將人種、民族、階級作為集合一部分人來排斥另一部分人的要素，因而導致國家之間和社會內部的分裂和衝突」。法西斯主義的極權制度「既以貶損人類的尊嚴而對個人有害，也破壞了社會的中介，最終使國家威信掃地。」「通諭」第二部分集中抨擊了納粹的排猶主義。它指出：「種族主義是對人類團結與人格尊嚴的否定，是對宗教和道德價值的否定」。「通諭」認為，天主選擇了以色列子民並與其締結了盟約，基督徒從猶太民族中分離出來，雖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但天主並沒有阻止基督徒與猶太人的關

係。[41]因此，那種以基督徒名義力行排猶的做法，是「以漂亮的口號蠱惑人心」的「掛羊頭賣狗肉」的伎倆，迫害猶太人與眞正的天主教精神沒有絲毫聯繫，是「在維護社會公正的名義下排斥社會的某一部分人群，是破壞社會存在的根基本身，是在召喚不息的仇恨，驅動各種形式的暴力活動，貪得無厭以及騷亂。它是反宗教精神的一架戰爭機器」。「通諭」文稿於九月底撰畢，交意大利著名天主教雜誌《公教文明》編輯羅薩(Enrivco Rosa)審閱，但羅薩突然病倒，於十一月逝世。十一月二十八日，教皇本人也因心臟病病倒。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教皇庇護十一世因心臟病去世。他顯然沒有時間對文稿進行審閱或修改。這份遒勁有力的文獻終於沒有頒佈於衆，繼任的新教皇則擱置了這份通諭。

總的說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天主教會的抵抗運動相當沉寂，但也並非絕無僅有。明斯特主教加倫曾明確反對納粹用「安樂死」殺害猶太人、老人和病人的行為。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即大戰爆發當天，希特勒即簽署命令，擴大經特別指定的醫生的權限，「使他們能根據一般常識判斷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病情危急時，出於慈悲考慮使之死亡」。通過偽裝的「德國療養院工作組」及「公益病人運輸搬運有限公司」以執行「安樂死」的計劃。這些事情傳開以來，在民衆中引起巨大不安。一九四一年八月三日，加倫在明斯特的蘭貝提教堂佈道時公開呼籲：

> 只要我們承認人們有權殺死「不生產的人」，即使現在起

41. 通諭引用了聖保祿的話：「『以色列人民是棵根子優良的好橄欖樹，在它的樹幹上嫁接了野橄欖樹的樹枝』。因此，基督徒不是樹根而是樹枝，不是以色列人通過『外邦人』(基督徒)得到救恩，而是恰恰相反。」

> 初只是指可憐的、無自衛能力的精神病人，那就原則上為殺害所有不生產的人也即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無勞動能力的殘廢者，因工傷事故和戰爭而致殘的人開放綠燈，為殺害我們大家——當我們年老體衰，失去生產能力時——開放了綠燈。[42]

新教方面幾位牧師也對此加以抵制。該行動終於在一九四一年末停止了，但受害者已達八至九萬人。[43]加倫是當時德國天主教會中較有聲望的人士。他於一九〇四年升神父，一九三三年升明斯特主教，一貫反對納粹民族社會主義和集權制度，凡發現納粹政權違反政教協定，他都直接當面向希特勒提出意見。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便抗議奧爾登的納粹分子拆除學校校舍上的十字架，結果引發群衆示威，迫使當局收回成命。納粹本擬將他秘密絞死，因二戰迅速結束而未及執行。一九四六年升樞機。[44]

除加倫以外，柏林主教座堂的教士委員會主任利希滕貝格神父(B. Lichtenberg)對納粹的反猶政策提出過批評。柏林主教伯雷辛(Von Preysing)也是一個徹底的反猶主義者。他試圖說服其他主教發表一份反對納粹集權制度及意識形態的公開聲明，但沒有成功。[45]總的說來，這些零星的抗議活動，勢單力薄，不成氣候。

從意識形態和歷史發展過程兩方面來看，天主教會與法西斯政權兩者之間存在着難以調和的分歧與衝突。天主

---

42. 埃爾德曼，《德意志史》(下)，同前，頁63-64。
43. 同上。
44. 《簡明基督教百科全書》，同前，頁171。
45. 《海外天主教動態資料》，1995(14)，頁6-7。

教會認為，基督規定了教會超世的宗向，並賦予教會以指導和統治權。教會的權利，包括對神職人員的委任與管理、對教會學校和醫院等團體組織的指導、對教民精神生活的影響和關懷，都是來自天主的賦予，正如國家的主權也是為其自有的主權，不是由另一個團體或個人賦予的。同時，個人和家庭的權利亦由天主所賦予，不能妄加剝奪。[46]法西斯國家，為了民族和國家利益，無論個人、團體、組織和教會，均須納入國家的軌道，個人必須無條件服從國家，學校必須推行法西斯教育，團體必須由政府加以管制，捨此之外別無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天主教會與法西斯政權的衝突導源於這兩種基本出發點的不同。應當承認，在法西斯主義民族和國家學說瘋狂猖獗的整個二戰期間，天主教會並沒有遭到根本性摧毀，這是頗為不易和難得的。正如聯邦德國著名史學家埃爾德曼在《德意志史》第四卷中所指出的：「天主教會的等級制度在納粹統治時期沒有受到觸動，在一個迄今所有的政治制度全被砸爛的時刻，天主教會保持了感人至深的團結一致。教會由於它所體現的超時代法則和預言立於不敗之地而為許多人所公認」。[4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羅馬教廷運用宗座外交的手腕，通過談判與德意志法西斯政權簽訂了政教協定，其結果有得失。其中，《拉特蘭條約》奠定梵蒂崗城國的法理基礎，使得教廷作為一個國家在近代國際舞台上有了接使、派使、拓展外交空間的現實可能，意義至關重大。但是與納粹政權的政教協定由於德國的背信棄義不久即成具

46. 羅光，《公教教義》，香港，1995，頁169。
47. 埃爾德曼，《德意志史》，同前，頁260。

文，納粹則達到了消除「中央黨」潛在威脅的目的。教廷得不償失。必須指出的是，教廷與意大利和德國的談判中作出了妥協，同意「人民黨」和「中央黨」的解散，犧牲了地方教會的利益，削弱這兩股天主教政治力量對法西斯和納粹政權的制約，無益於對法西斯運動的遏制。當然，羅馬教廷對法西斯政權的妥協，與當時總的國際背景有關。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出於各種原因，其中包括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不斷向納粹妥協綏靖，羅馬教廷一貫視共產主義運動為一種致命的威脅，也就在一九三七年，即教皇庇護十一世發表《火焚般的焦慮》的同時，也發表了另一篇用拉丁文撰寫的反對共產主義的《神聖救世主》(*Divini Redemptoris*)通諭，指摘唯物主義學說和蘇聯的反宗教政策。同時，對於法西斯干預西班牙內戰，教廷亦持同情態度，因為西班牙共和政府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亦執行反天主教會的政策，內戰時期有五千名教士、修女被殺，故教廷歡迎佛朗哥政權。[48]羅馬教廷既然在反共方面與西方國家有共同性，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視法西斯主義為反共的有生力量，並不惜與之妥協。此外，羅馬教廷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僅位於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的歐洲範圍之內，而且直接處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包圍之中，為自身安全計，出於策略的考慮，在表明態度時也要審時度勢。

然而，梵蒂崗城國除了它固有的世俗國家性質以外，作為全世界天主教會的精神領袖，又具有它自己所宣稱的神聖性質。歐洲有着深厚的天主教傳統，各國教民人數衆多，分佈也廣，而德意志兩國亦並不例外。從本文揭示的歷史資料來看，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羅馬教廷對法

48. 穆啟蒙，《天主教史》，同前，頁174。

西斯政權的起源和思想內涵，以及法西斯發動的排猶運動的實質已經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並得出了法西斯主義與天主教在本質上是相互違背的結論。然而，繼任的新教皇庇護十二世終於擱置了準備發表的通諭，這不能不說是迫於政治壓力的軟弱的表現。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它自己所宣稱的負有「社會的良心」和「人類的先知」的神聖使命。由於以羅馬教廷為代表的天主教上層人士缺乏天主教本身所崇尚的「為信仰而獻身」的殉道者氣概，去揭露法西斯的反人道本質，因而使得一般的天主教民衆在政潮迭起的時局中目迷五色，無所適從，直接或間接地妥協、縱容、助長和支持了法西斯的思潮，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可以設想，如果教廷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也許在當時並不能遏制法西斯主義的狂潮，但卻能喚醒人們對法西斯主義的後果產生警覺，並對法、德、意和被佔領國家的基督徒抵抗運動有所裨益。也正是基於這一點，今天，許多地方教會，如法國天主教會對維希政府時期、德國天主教會對整個二戰期間「教會的緘默」表示了公開的道歉，承認了「基督徒在第三帝國時代對民族社會主義和反猶運動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不作出應有的抵制」。「許多天主教徒表現得軟弱，甚至作出違心的錯誤」，從而沒有「負擔起公開抵制逆流的責任」。[49]這種為時雖晚、但卻值得回味和肯定的道歉，從側面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天主教會與法西斯政權複雜和多面的歷史關係。

49.〈德國天主教主教團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五十周年紀念時發表的聲明〉，載《海外天主教動態資料》，1995(14)。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